

启蒙思想的内在冲突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要: 启蒙思想家们不愿意把复杂的思想简单化, 而是希图在接受现代性的基础上超越现代性, 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拥抱现代性。由此可见, 20 世纪中国思想转型是在一系列内在冲突和相互和谐的悖论式处境里进行的, 并没有简单地拥抱西方的现代性。他们试图通过反思现代性的方式建构中国式的现代性。虽然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 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平台。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割裂 20 世纪的思想的历史, 而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开辟新世纪的思想道路。

关键词: 启蒙思想, 世界观, 理性主义,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20 世纪对于传统中国可谓一个转型的时代, 即从传统的中华帝国转向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现代中国, 从一个相对封闭而自足的文化体系转向开放的拥抱西方文明的文化范型。从我个人研究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领域来考量, 以前学界讨论和关注较多的是 20 世纪中国的文化转型。在这种研究模式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预设: 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二分的, 前者代表传统的价值系统, 而后者代表现代的文化价值, 从而一个文化的空间并置的关系被转换成了一种线性的时间叙述。换言之, 中国文化的转型就意味着如何克服古老文化的惰性与弊病, 融入世界性的欧美现代文明的浪潮之中。这样一种文化转型的思考当然顺应了历史的趋势, 但是这样一种研究模式显然是把 20 世纪中国思想的复杂性大大地简化了。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思路是简化了思想史呢? 美国已故著名汉学专家史华慈教授在其名著《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开宗明义便指出: “我认为, 在对待西方与任何一个确定的非西方社会及文化的冲突问题上, 我们必须同时尽可能深刻地把握双方的特征。我们所涉及的并非是一个已知的和一个未知的变量, 而是两个庞大的、变动不居的、疑窦丛生的人类实践区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不是一个自明的系统。两种文化都有着自身的复杂传统, 不能被作为一个整全性的客体进行处理。因为这两种传统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轴心文明的产物, 都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内在冲突和相互和谐的思想脉络, 而不是像非轴心文明那样是单一的、相对纯粹的体系。

从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学者一直到 20 世纪末的八十年代重新进行启蒙的思想家, 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重新解释中国的思想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过程。他们认为在向现代文明过渡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不仅存在对立和冲突, 而且也是相互纠缠和绞合在一起的复杂关系。它们不是泾渭分明迥然有别的关系。换言之, 中国文化传统同样地参与到了现代性的理解和建构中, 而现代性的思想又往往通过传统方式表达和显现。质言之, 中国的现代性只能是被中国思想传统重新理解的中国式的现代性, 而不可能是对西方现代性的简单模仿和移植。如果这样一种假设能够成立的话, 我们就必须换一种视角来考察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固有的认为现代性的建立就是从中国的黄色文明转向西方的蓝色文明的线性历史观受到了颠覆和批判, 过去所认同的似乎中国只能代表传统, 而西方才表征现代的单线历史观和时间观遭遇到学界的广泛挑战。如果说现代性是多元的, 像当今欧美与中国许

多学者在讨论的多重现代性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过去的那种简单地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空间并置的关系转换成为单向度发展的时间叙述就是一个必须重新被讨论的假设。五四时期,梁漱溟在《中西文化哲学及其比较》中睿智地指出,中国与西方文明都有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性质。如果这样一个前提能够得以成立的话,我们在从事思想史研究时就能够突破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分法的窠臼,而从一个更深刻的层面把握其发展线索和脉络,深入到两种文明的内部核心,从它们的相互纠缠和牵扯的关系网络来考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是如何想象和建构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在其内部又是怎样形成不同的分化和交叉,从而爬梳近代不同的思想传统与中国内部的文化传统、西方的思想传统有着怎样的脉络关系。在已经告别 20 世纪进入新世纪的处于新的转型时期的中国,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自然成了现代思想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学术界诸多学者都认为五四是中国现代性很重要的一个起源。我通过这些年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发现,过去我们把启蒙思想的内在复杂性过于简化了,甚至把五四时期的启蒙直接化约为从《新青年》到《新潮》的简单发展,因此把与之在表象上有所区别的保守主义思想剔除在启蒙思想体系之外。这是对丰富的启蒙思想的一种误读。其实如果我们粗略地回顾一下欧洲的启蒙思潮,就会发现启蒙思想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单一的思想体系。在近代欧洲的英国,从亚当·斯密到洛克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经验主义传统,在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代表了启蒙思想的浪漫主义传统,在法国情况更加复杂,伏尔泰代表了英国式的经验主义思想,卢梭则是一种崇尚反理性的非理性主义传统,笛卡尔则代表了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我们发现,即使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内部,各种启蒙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和复杂的,甚至存在内在的紧张和冲突。20 世纪西方思想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与后现代的各种冲突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

五四时期对西方启蒙思想的接受是全方位的,而西方启蒙思想又是非常复杂和多元的体系,因此,五四的启蒙思想出现相互歧异和紧张的状况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种来自不同源头的思想传统的相互冲突有些是整合在一个人身上,有些却是体现在不同的思想者身上。20 世纪的现代思想史形成了多元化的启蒙思想。一种是以陈独秀与他创办的《新青年》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另一种是以杜亚泉和他主持的《东方》杂志为代表的启蒙思想,代表了科学主义的启蒙传统。过去常常被认为是反启蒙的杜亚泉其实是反对激进和断裂、主张温和和调适的路线的另一种启蒙传统。而以梁启超、张君勱、张东荪等人物和《解放与改造》、晨报副刊、学灯副刊为代表的则是一种温和的改良的启蒙思想。所以,我将这种多元的启蒙思想命名为一种松散的启蒙网络。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五四的启蒙思想具有一种汪晖所谓的共通的同一性,也就是态度的同一性。即他们都肯定现代价值,试图超越传统的生活价值。但他们的共通性也仅仅如此而已。五四时期的论战既包括《新青年》与外部的论战,同时更多的是指 20 年代《新青年》阵营内部的分化和论战,在文化立场与政治立场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对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来说,冲突是内在的,而不是启蒙与反启蒙的紧张。职是之故,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梳理,我们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是如何涂抹着传统的印迹,而传统的价值是如何隐蔽地参与现代性的建构。所以,近代的启蒙思想的分歧是一场启蒙反对启蒙的现代性的内部的冲突。假设这个前提可以成立的话,思想史研究就应该着眼于史华慈教授所言的整体上未解决的现代性复杂性。也就是考察 20 世纪的中国现代性是如何被建构的,基本思想脉络是如何分布和形成、演化的,彼此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相互冲突和渗透的关系格局。这无疑是一件令人神往和富有意义的工作。正是因为 20 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内在冲突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决不可能用一种模式穷尽对它的阐释。例如学界常用的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改良与革命等二元对立的模式只能是遮蔽了启蒙思想的丰富性和紧张感。换言之,在某种历史目的论的导引下所建立的如上的线性历史观是无法涵盖现代性的复杂性的。可以说,对现代性的理解最终会导向一个怎样的结论取决于研究者的问题意

识和知识背景。在不同的问题意识的牵引下，研究者对启蒙思想的内在脉络的梳理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和意向。下面，我简单地从五个问题意识出发，勾画对启蒙思想的不同认知路向。

从变革模式来看，启蒙思想内部存在转化与调适的冲突。转化与调适这对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墨子刻提出。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存在两条不同的变革线索。主张转化的认为人的理性是万能的，人类根据和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充分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按照被认知到的规律人类就可以重新设计美丽新世界，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而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近代中国历史上，从谭嗣同到陈独秀再到毛泽东，都是依照这样一个思路在进行社会革命；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调适的变革模式。这种主张者认为，人的理性决不是万能的，人性中都存在张灏先生所谓的幽暗意识，因此，不可能按照所设计的美好蓝图去全方位地进行社会改造，而必须充分重视人类经验中累积的宝贵成分。即使要进行变革，也应该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进行接续主义式的社会改造。这条线索从晚清的梁启超开始延续到五四时期的杜亚泉、张君勱等人。当然，不同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完全单纯地按照一种模式在思考社会变革的途径。如胡适就主张在文化变革上应该进行新旧更替的转化，而在政治变革上可以进行推陈出新的调适。而陈独秀则是坚决主张在文化与政治层面都进行彻底的转化。

从世界观来看，存在一元论世界观和二元论世界观的紧张。汪晖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一个基本观点，他认为在近代中国变迁背后所隐藏的是从传统的天理观向现代的公理观的转变，当然他并不是简单地把它处理成传统到现代的置换，而是认识到在近代公理观的思想脉络里隐含和渗透着古代天理观的因素。在近代中国，从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理学发展而来的科学自然论的理学一元论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被近代的科学主义和自然发现所论证，相信世界存在一个涵盖自然与社会人生的客观的一元化的因果律。这条科学主义传统我们可以在严复、胡适和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中很清晰地感觉到。与此相对应的是从晚明心学尤其是王阳明心学发展来的科学与道德分离的心学二元观。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二分的，科学再发达也只能解决自然世界的事情，而无法回应人的道德价值、心灵世界的问题。关涉这种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只能由神学和道德哲学来解决。在梁启超、杜亚泉和张君勱等人的思想和表述中明显存在这样一种心学二元观。我近来在从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就发现这两种世界观指引下的学人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差别。胡适因为持一元化的世界观所以他认为文化都是普世性的，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问题。而在二元化世界观影响下的梁启超、张君勱等人看来，科学与道德、制度与精神是二分的，科学制度上我们可以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文化精神则必须在民族文化的自身传统内部寻找其认同和突破的方向。

从政治思想来看，近代中国有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两种思想传统。在西方思想内部，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有不同的思想传统与制度传统，同时为西方思想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贡献。自由主义民主的贡献在于它确立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主张通过宪政等建制化的方式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而共和主义民主则侧重强调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强调主权在民，认为只有在一个具有广泛公意基础和公民政治参与的前提下建立的政治制度才是合法的和正当的。从以赛亚·伯林的角度来考察，这两种民主其实就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不同的自由观和政治观。它们是相互影响和依赖的。英国政治思想史家斯金纳在其著作《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就严密地论证了这两种自由传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民主观对中国近代的民主思想有着不同的影响。从严复、胡适、张君勱一直到台湾的殷海光、张佛泉沿袭和展现的是自由主义民主思想，而从张东荪到徐复观则展示了共和主义民主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两种民主观念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传统，并且产生了紧张和冲突。

从文化趋向来看，西方启蒙思潮内部就存在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传统，如我在前面所论述的法国启蒙思想就说到它既有卢梭式的浪漫主义也有笛卡尔式的理性主义，那么这种歧异的思想理论被引入中国与古老的传统结合使思想状况更加复杂，导致出现了不同的文化趋向。从胡适到张佛泉可以被称为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采取知识主义的态度，强调理性的认知和改造的力量。而以傅斯年、殷海光等人则代表了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重视道德力量和实践品格，人格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其实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这两种传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观念的复制品，其来有自。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延续了以朱熹为首的宋明理学中的道问学的传统，而浪漫主义自由主义则更多地继承了以王阳明为首的强调知行合一的尊德性的传统。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绞结在一起形成了启蒙思潮的内在冲突。

从社会意识的角度来看，启蒙思想存在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不同的路向。严格地说来，中国的思想传统从来就不是个人本位的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本位的范型，而是一种强调个人与集体互动、个人与社群和谐的伦理本位式的文化类型。这种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了晚清和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但是尽管这样，我们如果细致地考察中国近代思想史尤其是后五四时期，可以发现在个人与社群之间仍然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承认个人与社群互动的前提下，比较侧重个人的思想家有胡适、鲁迅和周作人等，他们秉承的是中国式的个人主义传统。而在同样的前提下，比较偏向社群的有梁启超、梁漱溟等。

当然，我采用这种粗线条勾勒的方式仅仅是为了使论证结构清晰，但这决不意味着我认同那种纯粹的简单化的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和思维模式。我从来就认为启蒙思想是充满内在的冲突和紧张性的，同时又存在相互认同的层面和细部。而且冲突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有时在同一个思想家内部同时存在不同的思想理路和分析言路。我称之为启蒙思想家的自我冲突。如梁启超、胡适和鲁迅等人就有这种情况。20 世纪中国思想既秉承了中国自身传统，同时又借鉴了西方思想，而知识分子群体在这样一个思想转型时代的精神面向又异常丰富和复杂，所以形成了现代思想的丰富性。即使在五四的分化以后，不同的思想脉络还是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现代思想家试图运用中国的经验、智慧和传统来调适和超越现代启蒙思想的内在冲突和对立。启蒙思想家们不愿意把复杂的思想简单化，而是希图在接受现代性的基础上超越现代性，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上拥抱现代性。由此可见，20 世纪中国思想转型是在一系列内在冲突和相互和谐的悖论史处境里进行的，并没有简单地拥抱西方的现代性。他们试图通过反思现代性的方式建构中国式的现代性。虽然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想平台。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割裂 20 世纪的思想的历史，而必须在扬弃的基础上开辟新世纪的思想道路。

The Inter conflict of the Enlightenment Ideas

Xu Ji-l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062)

Abstract: The thinker of enlightenment era will not take a simple angle to the complicated idea .What they hope is to exceed modernity when accept it and thinking modernity when enfold it. In a word the conversion of 20 century China idea was completed during a series of inter conflict and harmoniousness. They wanted to create the modernity of Chinese by thinking modernity. Though they failed to complete it they gave a thinking chance for us. We can not forget the history of the 20 century so we should create our thinking road by developing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idea; world view; rationalism; modernity

收稿日期: 2005-05-08

作者简介: 许纪霖, 汉族, 上海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博导。